



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复兴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丛书

构建现代治理基础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

贾康 刘薇◎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复兴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丛书

构建现代治理基础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

贾康 刘薇◎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40 年/ 贾康，刘薇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454-5811-4

I. ①构… II. ①贾… ②刘… III. ①财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8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7691 号

出 版 人：姚丹林
责任编辑：韩文君
责任技编：许伟斌

Goujian Xiandai Zhili Jichu

Zhongguo Caishui Tizhi Gaige 40 Nian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商大厦）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6.25 2 插页
字数	563 000 字
版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454-5811-4
定价	9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020）38306055 37601950 邮政编码：510075

邮购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020）37601980 营销网址：<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回顾与展望丛书

编 委 会

EDITORIAL BOARD

| 编委会主任 |

魏礼群

| 编委会副主任 |

张卓元 迟福林

| 编 委 |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蔡 武 曹远征 常修泽

迟福林 贾 康 李晓西

隆国强 宋洪远 宋晓梧

王 珺 魏礼群 张卓元

郑新立

总 序
P R E F A C E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和极为艰辛的探索。经过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认识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改革开放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鲜明的特征。

1978 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化；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就是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推进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伟大历史性转变；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变。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人类史上的伟大奇迹，经济总量连续跃上几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小康生活，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同时，我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是全国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道路的深刻总结，也是实现未来更加美好目标的根本遵循。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隆重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当前，我国不仅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还处于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我国未来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继续沿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奋勇前进。

2018年，我国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为此，广东经济出版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袂策划并组织出版“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

与展望丛书”，献礼党的十九大，献礼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套丛书共13本，分别针对行政体制改革、计划投资体制改革、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所有制结构改革、农村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环保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从不同角度客观记录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并展望改革开放的未来趋势。

这套丛书的主编和作者大多是相关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这套丛书集结了他们长期亲历和研究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凝聚了他们对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一腔热情。广东经济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全力支持；作为以直谏中国改革为己任的改革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为此书的策划、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编委会主任，我对为这套丛书付出艰辛努力的各位编委会成员、作者，对出版社的领导、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套丛书跨越多个领域，力图客观地反映改革开放伟大历程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意义重大且任务艰巨，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魏礼群

2017年7月



导论 转轨中促进包容性增长，支撑全面改革：财政体制变迁背景 /1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与财税体制改革 /1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新阶段无可回避的全面改革 /14

第三节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财政改革探索的回顾 /22

第一章 经济体制转轨下的财政体制改革 /87

第一节 财政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 /87

第二节 财政体制探索取得的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 /103

第三节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试点 /110

第二章 分税制改革开启经济性分权的序幕 /114

第一节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出台背景和过程 /114

第二节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主要内容 /118

第三节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127

第四节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135

第五节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特点及重要意义 /155

第六节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159

第三章 税收制度改革 /186

第一节 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与税收体系 /186

第二节 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税制改革与税收体系 /202

第三节 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税制改革和税收体系 /215

第四节 税制改革评述 /229

第四章 国有资产收益制度改革 /232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 /232

第二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国有资产收益管理 /236

第三节 2007年起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38

第四节 改革行政事业单位和资源性国有资产收益管理制度 /246

第五章 公共债务制度改革 /248

第一节 国内债务管理制度改革 /248

第二节 政府外债管理制度改革 /262

第三节 地方债的制度建设 /270

第六章 财政管理改革 /281

第一节 预算编制管理改革 /281

第二节 预算执行管理改革 /302

第三节 财务与会计改革 /320

第四节 财政法制建设 /352

第五节 财政监督制度与改革 /366

第六节 财政信息化建设 /379

第七章 财政宏观调控与国际协调 /391

第一节 财政宏观调控的体制背景与特征 /391

第二节 经济体制转轨下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1978—1992年） /399

第三节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3—1997年） /407

- 第四节 积极财政政策（1998—2004 年）/420
- 第五节 稳健财政政策（2005—2007 年）/436
- 第六节 积极财政政策（2008 年至今）/447
- 第七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加强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 /463
- 第八节 财政宏观调控功能不断强化 /470
- 第九节 财政政策的国际协调 /473

第八章 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财税体制改革新进展 /492

- 第一节 现代财政制度提出的背景及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492
- 第二节 财税体制改革三大方面新进展 /498
- 第三节 政府债务管理改革新进展 /527

第九章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愿景展望 /533

- 第一节 回顾：近 40 年财政改革的基本经验和评价 /533
- 第二节 展望：在全面改革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要领 /555

参考文献 /562

后记 /568

导论

转轨中促进包容性增长，支撑 全面改革：财政体制变迁背景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进程中，也走过了曲折的探索之路，经历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变迁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性变革等阶段，可以说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改革都十分艰难。作为历次经济与社会变革的重要突破口，财政体制的改革对于经济体制以及社会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章梳理1949年以来至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经济体制和政策变迁过程，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作出概括，以为本书后面关于改革开放之后近40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展开论述作出铺垫。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与财税体制改革

一、曲折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沿着时间轴回望——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4年第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1988年第十三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1993年第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1998年第十五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2003年第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008年第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问题。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定位为“全面深化改革”，可谓于关键的时点，以前所未有的广泛性、深刻性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此次中央全会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表述，配以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和要求，标志着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到“决定性”作用的新时代，整个中国改革进程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开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一）计划经济时代对“市场经济”的探索

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此后陆续出现了各种急于求成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国民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和遇到了各种困难。在“一大二公”的趋向中，市场经济的空间虽然逐步被压缩到了集贸市场和对外贸易等有限领域，但这些市场经济的因素仍在沟通广大城乡和外部市场，为其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保留了市场机制的火种。

通过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而且当时在社会上有相当多的赞同者。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曾设想搞计划经济，还创建了大量官营企业，制定了很多经济发展计划。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要实现赶超就得搞计划经济，就得学苏联，发达了以后再搞自由市场经济。曾信服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马寅初在1929年后也有了明显转变，他在1935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造》，论述了“吾国何以必须采用统制经济”的七大理由，认为“中国欲以自由竞争政策发展其实业，势已不能。然则中国经济之出路，只有统制经济

之一途。”^①

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设想中已经包括了计划经济成分，既承认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强调这种自由要受国家必要的限制。1948年刘少奇在《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中提到：“根据实际的可能和必要来适当地逐步地加以计划和组织，才能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按照我们和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尽可能迅速地向前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然避免提到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已经提到计划经济的方向，其中第三十三条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第三十七条提出国内贸易的自由应“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该纲领还对各种经济成分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属性的划分，其中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负有领导、引导的责任，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建立之初，党中央还是强调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1953年初，毛泽东曾指出：“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②1953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提到，“对于手工业者，也应如同对待小生产者的农民一样，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主要是靠价格政策，市场产销关系，辅以必要可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教育指导他们，影响他们，慢慢引导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而不可任意地制订计划，强制他们发展哪一行或闭歇哪一行，增产多少或减产多少。”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①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见《马寅初全集》（第8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4—177页。

^②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17—318页。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现偏差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曾重新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所以“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还专门向参会的九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询问了各地商品交换情况。就10月召开的西安会议上有人提到要取消商业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产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反复讲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要搞商品生产。为了集思广益，11月13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建议讨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的问题。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在后来纠“左”过程中，这个决议的正确性得到了人们的公认。

1961年4月10日，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委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率队到河南长葛蹲点调查。习仲勋在那里住了135天，深入基层做广泛调查，向中央与河南省委连续写了11份调查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护农村劳动力、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制度、顺应市场规律、包产到户经营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习仲勋提出，政府应把伸出的手缩回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1961年8月7日，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小组给党中央和邓小平写的《长葛县和尚桥镇市场情况的调查》中，明确提出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只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处理做买卖的问题。要学会用经济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市场。”“对市场价格的管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限价办法，也不能放任自流。主要靠经济活动的方法，如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商品上市量；国营商店、供销社参加集市贸易等。在行政管理上最好是利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对于应当限制的，课以重税。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又不影响活跃市场。”^①习仲勋这些话，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962年，刘少奇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提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政策。“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即“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和取向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其后繁复的政治运动淹没了。

（二）改革开放前期对“市场经济”的探索

从《邓小平年谱》来看，邓小平第一次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发言是在1979年11月26日。这天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时任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时任主任林达光等。在谈话中，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他指出，实现现代化“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这份重要文献，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当时的背景下，邓小平第一次突破了姓“社”姓“资”的局限，认为市场

^① 孙斌于、茂世文：《习仲勋1961“长葛调查”》，《大河报》2014年4月10日，第10—21版。

和计划是手段和运行机制层次上的区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出任国务院财经委主任，开始着手调整经济体制。1979年春，陈云起草《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从追溯计划经济的思想渊源入手，分析了计划经济的缺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他写道：“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这份提纲披露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多次发表谈话。1982年12月2日，陈云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同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又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比喻为“笼子与鸟”的关系。陈云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陈云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解放思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重视市场因素，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此后，党和政府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认识阶段。

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认识被正式写入了《宪法》：“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正式提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一步重要推进，它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强调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改革起步开拓了道路。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这份文件对新的经济体制的基本点作出了如下的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按照以上要点改革的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计划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中期和长期计划上来，适当简化年度计划，并相应改革计划方法，充分重视经济信息和预测，提高计划的科学性。”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指出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就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对这个新的定位，报告作了相关阐述。这是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命题的带有突破性质的重要解释和补充，不仅不再提谁主谁辅，而且没有提及“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只是将计划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并明确表示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强调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以间接管理为主。可以说，十三大报告基本确立了改革的市场取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终于一步步告别了计划经济。

（三）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怀着对党、人民和社会主